

代序论 文本及历史记忆的多样性

——合浦汉唐史料综述 胡晓旭

合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于秦汉时代即已被纳入华夏文明的怀抱。汉唐时期合浦地区文明生态的嬗变，既是古代南海贸易圈的生成与自身社会变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亦见证了华夏文明主导下的岭南地区多元文化互动融合的历史进程。因而搜集、整理和考订汉唐时期合浦地区的历史文献及相关信息，对于进一步认识与探讨合浦在中国中古时代的历史存在形式及其在岭南地区早期开发进程中的定位，从而为合浦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均具有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合浦作为岭南地区滨海地域的一个独立地理单元概念，最早的文献记载可追溯至《汉书》等汉代史籍，其后历朝历代史不绝书，绵延至今。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古代知识及文化信息系统的构建与延伸，普遍具有承前启后的优秀人文传统的基因，故而汉唐时期合浦的历史记忆不仅载于同时期的文献著述，宋以后的历代文献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保存了关于汉唐合浦史事的追忆，因此为了完整地还原和勾画出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与文化遗产中的合浦记忆，应将考察的视野延伸扩展至由汉唐至明清的整个传世文献系统。而且，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及文化资源的积累和传承是通过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书体制及金石材料等多种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文本媒介实现的，依托近代以来日益成熟的“金石证史”与“诗文证史”的治学工具，应在搜集整理历代合浦文献及金石碑刻材料等史料资源时，努力实现无死角、全方位的覆盖，为进一步还原构建合浦历史、人文、社会变迁的完整拼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基于以上思路，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传世文献及金石碑刻材料中涉及合浦的资料进行系统搜集和初步整理，按照现代史料学的分类体例和规范分别加以论述。《历代文献中的合浦汉唐史料汇编》中广泛搜罗经、史、子、集等文献史料，共收入各类文献 270 种，编成数十万字。本书收录文献范围广，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艺术、医学、物产等领域，现按纪传类、编年类、典章诏令类、经部小学类、地理类、方志类、类书类、杂史类、诗文集、宗教类、艺术类、书目类等 12 类分别简单介绍和评价其史料价值。

一、经史正籍中的历史脉络

（一）纪传类文献

纪传类涉及汉唐合浦的文献收入 18 种，分别为《史记》《汉书》《前汉纪》《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晋书》《魏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元史》。

以上正史典籍对合浦的记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合浦的地理建置沿革；二是合浦设官和获罪官员及其家人流放合浦的记录；三是岭南俚僚的反叛及其与中原王朝的交战状况；四是关于合浦珍珠的记载和轶事。历史上合浦地区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汉书》卷六记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1]，《汉书·地理志》则进一步详述合浦地理建置、人口、辖县等情况，这是合浦设郡和合浦地理概况的最早记载。此外，在《三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中均有对合浦地理建置及其变更的记载。这些文献是研究汉唐合浦地理变迁的第一手史料。

《汉书·地理志》中有一段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大珠至围二寸以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2]

文献中载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说明合浦至少是汉代通往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应为文献中提到的“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及“黄金”“杂缯”等。近年来，东南亚各国相继出土了汉代的金银器，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再次证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另外，文献中提到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谶离国”和“黄支国”等，应是东南亚国家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这一段史料记载对研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及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合浦地区的相关史料并没有直接记载详细的设官情况，而是在事件叙述中涉及有关的官职，如《后汉书》中，费贲“仕至合浦太守”^[3]，以及《太平御览》收录的古佚文献《交广二州记》中，载有“合浦之士有尹牙，为郡主簿”^[4]。获罪官员及其家人流徙合浦的相关文献记载也同样散见于正史的帝纪和列传中，如《汉书》有载，“史立时为中太仆，丁玄泰山太守，及尚书令赵昌譖、郑崇者为河内太守，皆免官，徙合浦”^[5]，“（董贤）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6]。此类文献史料显示出中原王朝对合浦乃至岭南地区大一统秩序的构建及其控制力的增强，流人贬官对合浦地区的开发及汉化进程的影响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涉及从汉代到唐代各个时期合浦地区南方少数民族反叛和政府征伐俚僚的记载，主要

集中在正史的四夷传中。从两汉到魏晋，合浦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南方少数民族发起了多次叛乱，中央政府随后派兵镇压。东汉光武帝时，“（建武）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并为盗贼”^[7]。随后，马援拜为伏波将军率军平叛，于建武十九年（43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8]。而后灵帝“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9]。光和四年（181年）二月，“交趾刺史朱儁讨交趾、合浦乌浒蛮，破之”^[10]。而唐代统治者则在合浦等边地推行羁縻政策，“宁宣亦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11]。此类史料不仅对研究当时岭南地区族群社会的历史面貌有着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而且可以从史料的书写中发掘出中央政府对岭南俚僚态度和政策的变化。

《后汉书·地理志》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中提到珍珠是汉代南海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后汉书·孟尝传》《晋书·陶璜传》及《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记叙了从汉代到唐代政府对合浦珍珠的管理和珠禁政策的变化，这为学界了解汉唐合浦珍珠和南海贸易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二）编年类文献

编年类文献采用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记载体例，侧重于展现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和互相关联。关于汉唐合浦的编年类文献有4种，分别为《建康实录》《资治通鉴》《大事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对于合浦地区的记载，此类文献与纪传类文献的史料来源大致相同，有的甚至是在纪传类史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只是在表述上略有不同，可以在史料记载的多样性上对纪传类史料做补充。

（三）典章诏令类文献

典章诏令类文献在形式上与类书相似，分门别类罗列资料，而在词汇使用上更侧重政治性，因此又可视其为政书。此类文献有7种，分别为《通典》《唐会要》《唐大诏令集》《东汉会要》《通志》《钦定续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收录了唐代岭南合浦豪族的成员、谏议大夫宁原悌的疏文，“景云元年十一月，谏议大夫宁原悌上疏曰：‘今天下诸州良牧益寡何者？古难其选，今侮其职也。然而世所重于京都，时见轻于州县者，何也？古者，牧守、政成、擢登三事，郎官特秀，先宰一同。诚愿尚书旷职，则于方伯求才，即卿列阙官。必须循材擢用，兹令若行，仁风扇矣’”^[12]。此疏文展现了宁原悌对“诸州良牧益寡”这一问题的思考。据《唐六典》记载，谏议大夫在唐代属于中央机构中的门下省^[13]，宁原悌身为岭南边地的豪族成员，能够担任中央的谏议大夫一职，这一事件和其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中原王朝对岭南边地的重视及不小的控制力。

（四）经部小学类文献

经部小学类收录了2种文献，即罗愿的《尔雅翼》和郭璞注、邢昺疏的《尔雅注疏》。

《尔雅注疏》中有载，“马属，释曰：自駒駉已下虽骏异，毛色不同，皆马之属类，故以此题之也，下仿此。摩牛，注：出巴中，重千斤。犛牛，注：即犛牛也，颌上肉撮肤起，高二尺许，状如橐驼，肉鞍一边，健行者日三百余里。今交州、合浦、徐闻县出此牛”^[14]。此类文献以注疏的形式记录了合浦当地特有的风土物产，是古代文人精英笔下合浦印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五）地理类文献

地理类文献收入从东晋至清代关于汉唐合浦地理方面的众多著述，内容丰富，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合浦汉唐时期的地理概貌，是研究合浦乃至岭南地区古代地理的重要典籍，对研究合浦乃至岭南地区汉唐时期的地理建置沿革、山川、城池、物产、风俗等也有重大参考价值。地理类文献收入 16 种，分别为《南方草木状》《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北户录》《太平寰宇记》《輿地广记》《方輿胜览》《通鉴地理通释》《岭外代答》《齐乘》《岭海輿图》《蜀中广记》《桂胜》《禹贡长笺》《禹贡锥指》《行水金鉴》。《南方草木状》为西晋人嵇含所撰，书中首次记载了魏晋时合浦丰富的物产及其性状和用途，如益智子、吉利草、合浦杉、桂、优殿等，是研究合浦物产和风土的珍贵史料。

如合浦杉叶飞入洛阳城的最早的两种记载，分别见于《南方草木状》和《交州记》中：

杉，一名披黏，合浦东二百里，有杉一树。汉安帝永初五年春，叶落，随风飘入洛阳城。其叶大常杉数十倍，术士廉盛曰：“合浦东杉叶也，此休征，当出王者。”帝遣使验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树，役夫多死者。其后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过足相容，至今犹存。^[15]（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

刘欣期《交州记》曰：合浦东一百里有一杉树，叶落随风入洛阳城内，汉时善相者云：“此休征，当出王者。”帝遣千人伐树，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株上食，适足相容。^[16]（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十九）

刘欣期《交州记》曰：合浦东二百里有一杉树，叶落随风入洛阳城内，汉时善相者云：“此休征，当出王者。”故遣千人伐树，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过足相容。^[17]（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七）

其中，《南方草木状》和《交州记》对“合浦杉叶”传说的记载基本一致。《交州记》应在明代以前散佚，唐宋时还可看到其完本^[18]。西晋人嵇含所作之《南方草木状》较晚见于史志，其首载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亦照录之。^[19]《四库全书总目》有载，“（《南方草木状》）晋嵇含撰……考《隋志》《旧唐志》俱有含集十卷，而不载此书，至《宋志》始有著录”^[20]。唐至宋初本草家已有引用《南方草木状》，但与南宋始见的《南方草木状》统一版本收载的品类、内容、文字都不尽相同，可见此书

由唐至宋尚有多种版本，而南宋统一版本的形成似有一个完善、趋同的发展过程。^[21]故而唐宋时期的两部类书在收录“合浦杉叶”条时，很可能未见含有“合浦杉叶”条的《南方草木状》相关版本。现存的《南方草木状》共有三个版本，分别为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和汉魏丛书本，其中百川学海本是最早的完本，始见于宋人左圭所辑《百川学海丛书》，商务印书馆曾据此排印丛书集成本，这应是现存最早、内容最全、错误最少的善本。^[22]本书即选用此本。翻检此三个版本的《南方草木状》，并未见“合浦杉叶”条的内容。

现存最早征引《交州记》的《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在合浦杉叶的记载上有两处细微的差异。一是《艺文类聚》中为“合浦东一百里”，而《太平御览》中则为“合浦东二百里”；二是《艺文类聚》中为“三百人坐株上食，适足相容”，而《太平御览》中则为“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过足相容”。而后世其他文献在引用《交州记》中关于合浦杉叶飞入洛阳城的记载基本与《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所言一致，只有清人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与《交州记》系列之记载有所不同。《格致镜原》征引的《交州记》“合浦杉叶”内容如下：

刘欣期《交州记》：合浦东百里有一杉树，汉安帝永初五年春，叶落随风飘入洛阳城，其叶大常杉数十倍。术士盛廉曰：“合浦东杉叶也，此休征，当出王者。”帝遣千人伐树，役夫多死者。^[23]

其中涉及的两处关键性记载——“汉安帝永初五年春”和“术士盛廉”，在最早征引《交州记》的《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中并没有提及，之后的文献更是没有类似的表述，《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则用“汉时有善相者”来表述。而《南方草木状》及后世征引《南方草木状》的文献中，则有“汉安帝永初五年春”和“术士廉盛”的表述。由于《格致镜原》成书于清代，陈元龙所能看到的《交州记》应该也并非原书，而是散佚之后存于唐宋诸书中的零星内容。由此可以断定《格致镜原》中记载“合浦杉叶”的内容是征引自《南方草木状》，并不是来自《交州记》，“盛廉”与“廉盛”之差应是誊抄之误。

关于合浦杉叶飞入洛阳城的这一条，选用记载更为详尽的《南方草木状》中的“合浦杉叶”条来加以分析。文中所言，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合浦杉叶比常见杉叶大数十倍，随风飞入洛阳城。当时的术士解读这一异象，认为是“休征，当出王者”。这种关于异象和解读异象的记载，应是从西汉中晚期社会上开始流行的讖纬之风的延续。汉代讖纬受到当时思想界天人合一、阴阳灾异的影响，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历史上的众多统治者也曾采用讖纬的方式达到角逐权力、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而汉代的众多经生儒士很快认同了讖纬之学，充分汲取其内容以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往往“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24]。学者李零认为，与官方关系密切的方士儒生，既明经艺，又通方术，驰骋穿凿，迎合帝王，带有较多的官方色彩。特别是哀帝、平帝之后，图讖蔚兴，

王莽矫用符命，光武帝尤信谶言，对儒者的方士化更是推波助澜。^[25]“合浦杉叶”条中所载的术士应即是汉代方士化的儒生。

术士解读合浦杉叶这一异象，认为乃是“休征，当出王者”。颜师古注《汉书》，提到“休，美也；征，证也”。“合浦杉叶”这种象征着出王者的吉兆，对于汉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却是一种威胁。东汉乃至魏晋时期的异象，以谶纬的方式解读出来，经常带有政治性的意味，而谶纬其实也是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映。“合浦杉叶”象征出王者的征兆，恰恰与汉代合浦地区“蛮夷”多次叛乱的事实相符合。“合浦杉叶”条所言，汉安帝遣人验证合浦杉叶一事，并派人前去伐树。汉安帝遣人伐树之举的这条记载，显然反映了中原王朝对合浦这一边远之地的“蛮夷”时常反叛的担忧和不信任的态度倾向。此后，合浦杉叶飞入洛阳城的记载在魏晋以后其意味发生了转变，变成了流落合浦的中原士人诗中的典故，如南朝陈时流寓岭南的士人江总，有诗云：“传闻合浦叶，远向洛阳飞……太息关山月，风尘客子衣。”^[26]还有唐代宫廷诗人宋之问流放钦州所作的“作伴谁怜合浦叶，思归岂食桂江鱼”^[27]等，均选用“合浦杉叶”典故来表达对中原的思念和忠诚。

宋代地理总志《舆地广记》务在详尽，有不少涉及合浦但已散佚之书都在其中得以保存，如张勃的《吴录》、刘欣期的《交州记》等，均为珍贵的史料。今本《元和郡县志》载岭南道阙数州，为原来汉合浦郡地，此书可以补缺。记载山川、城池等故地遗迹，此书详于《元和郡县志》和《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特别是合浦唐代的部分，《元和郡县志》不载之处往往此书有载。

《舆地广记》记载成都时提到了“珠官”。“珠官”作为合浦的古称之一，始于吴黄武七年（228年）孙权将合浦郡改为珠官郡。曾任吴合浦太守的薛综上疏：“赵佗起番禺，怀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28]此处的“珠官”即为合浦郡地。《水经注》中为“珠官”的命名做出了解释：“郡不产谷，多采珠宝，前政烦苛，珠徙交趾。会稽孟伯周为守，有惠化，去珠复还。”^[29]随后，珠官郡很快被改回合浦郡。《晋书·地理志》有载，珠官为合浦郡下辖的一个县，而《舆地纪胜》中认为，“《晋志》合浦郡下有珠官县，《宋志》无珠官县”^[30]，故而珠官县应在刘宋时期便已经被废除。虽然“珠官”一名不再用于官方地理行政单位的名称，但却作为合浦之地的别称在知识精英的记载下一直见诸史料。《舆地广记》将“珠官”与“锦官”并称，“成都旧谓之‘锦官城’，言官之所织锦也，亦犹合浦之‘珠官’云”^[31]。众所周知，蜀锦是蜀汉重要的财政来源，锦官城乃蜀汉王朝为保护蜀锦的生产而设置，唐代诗词中引用颇多，如杜甫诗“花重锦官城”等。按照《舆地广记》“锦官”条中所云“锦官”为“官之所织锦”的含义，那么“珠官”的意味则是“官之所采珠”，即官方采珠之地。这条史料中将“珠官”与“锦官”相提并论，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就物质文化符号意义的影响传播而言，以“珠”名世的合浦并不亚于拥锦自重的成都。

宋人乐史等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不仅详述沿革、广征史迹，而且依方志旧例增补风

俗、姓氏、人物等目类^[32]，其中关于合浦地理部分的内容，汉代和唐代占很大比例，而且在篇幅、目类、时限等方面都超过了《元和郡县志》，是研究合浦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明人张鸣凤所作《桂胜》与《桂故》为明代广西历史地理著作，载有关于唐代合浦僧人造佛像的记录，是十分少见的记载。

（六）方志类文献

方志类文献收入从东晋到明清时期的众多学者的著述 18 种，内容包罗万象，可谓汉唐合浦的百科全书。其中，《华阳国志》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也是最早记载合浦地区的方志文献。《华阳国志》中对于合浦的某些记载对后世史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对合浦太守费贻的记述，是《后汉书》和《资治通鉴》中费贻相关记载的史料来源。合浦正式的方志主要是明清两代编写的，涉及整个岭南地区的有《明一统志》《清一统志》《湖广通志》《广东通志》《广西通志》等，比较重要的地区性方志有《廉州府志》和《合浦县志》，在明崇祯和清康熙、乾隆、道光等几个时期先后编纂多次。其中，《廉州府志》和《合浦县志》分门别类记述合浦地区的建置沿革、地理风物、人物及诗文等内容，使读者能够提纲挈领地整体上把握汉唐时期的合浦地区风貌。

（七）类书类文献

类书类文献为中国古代的大型资料性书籍，分门别类罗列各类资料，本书收入自唐至清代的综合性著述 23 种，底本文献数量庞大，达 5923 卷。涉及汉唐合浦的唐宋类书有欧阳询等的《艺文类聚》、徐坚的《初学记》和李瀚的《蒙求集注》3 种，北宋类书有王钦若等的《册府元龟》、李昉等的《太平御览》、王应麟的《玉海》等 10 种，明代类书有彭大翼的《山堂肆考》、陈耀文的《天中记》等 7 种，清代类书有陈元龙的《格致镜原》等 3 种。北宋官修类书《太平御览》中保留了很多其他书目已经散佚的关于合浦的内容，如《南方草木状》中合浦所出的短头细黄鱼、番鸠，《交州记》中合浦当地采珠人祭祀的石室、越王铜缸、麕角、糠头山等，《南州异物志》中的合浦蛮俚和善水性的采珠人等。其中，刘欣期《交州记》是六朝时期岭南地区较为重要的志书，遗憾的是该书早已散佚，仅见于唐宋以来诸书所引的佚文。故而此书对钩稽已经散佚的合浦史料，研究合浦风俗、物产、饮食等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很多魏晋文士的别集现已失传，如庾肩吾等，而唐人欧阳询等所编的《艺文类聚》则保存了这些别集中的部分内容。如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庾肩吾有《梁度支尚书庾肩吾集》10 卷，然而唐时就已经散佚，《艺文类聚》则保存有庾肩吾的《咏风》，诗中有云：“苍梧洞犹在，合浦树应疎。”^[33]此外，还有唐人尹枢的《珠还合浦》、王奉珪的《明珠赋》等都依靠此书才得以保存。

二、稗官、杂史及方外典籍中的风俗记忆

(一) 杂史类文献

杂史类文献基本为非官方编纂的史料，不见于史传，侧重于反映当时的物产、风俗和轶事，在内容上可与纪传和编年等文献做比较和补充。本书收入杂史类文献31种，涵盖杂史、传记、小说、医书、农书等各种民间史料。杂史有《金楼子》《海录碎事》《能改斋漫录》《越史略》《粤西丛载》等23种，传记有《廉吏传》《百越先贤志》2种，小说有《酉阳杂俎》《清异录》2种，以及农书《齐民要术》1种和医书《证类本草》《本草乘雅半偈》《续名医类案》3种。其中唐人段成式编撰的《酉阳杂俎》虽为志怪小说，但与其他志怪小说多有不同，有实际可用的史料，如收入了已经散佚的《南康记》中“合浦有鹿”^[34]条，有助于了解当时合浦的物产及其分布。北宋陶穀的《清异录》则载有汉隐帝“手中犹持小摩尼数珠凡一百八枚，盖合浦珠也”^[35]，这反映了不见于史传的汉代皇室的日常用度和合浦珠很可能是合浦地区向统治者进贡的贡品。此外，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录的合浦植物——眊藤、筒子藤：“眊藤，生山中，大小如草蒿，蔓衍生。人采取剥之以作聒，然不多。出合浦兴古。”“筒子藤，生缘树木，正月二月华色，四月五月熟；实如梨，赤如雄鸡冠，核如鱼鳞。取生食之，淡泊无甘苦，出交趾合浦。”^[36]这些都是研究合浦魏晋时期风物的珍贵史料。

(二) 诗文类文献

诗文类文献收入了合浦古代诗文、词曲和文学评论等著述，作者众多，内容丰富，充分反映了汉唐时期合浦地方文学特色的全貌，是研究合浦乃至岭南地区古代文学的重要典籍，对研究合浦乃至岭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诗文类文献分为总集类、别集类、诗文评类、诗类和词类，收入137种。其中总集类有蒲积中的《岁时杂咏》、陈亮的《苏门六君子文萃》等37种，别集类有庾信的《庾子山集》、张说的《张燕公集》、元稹的《元氏长庆集》、苏轼的《东坡全集》、张养浩的《归田类稿》、宋讷的《西隐集》、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等94种，诗文评类有计有功的《唐诗纪事》等4种，诗类有陈大章的《诗传名物集览》1种，词类有黄机的《竹斋诗余》1种。诗的部分多化用“珠还合浦”“合浦杉叶”和“合浦牛衣”等典故，而文的部分则多涉及官员流徙合浦、合浦任官及合浦珠等历史事件。诗文类文献承担了叙写和抒情的双重意蕴，以“合浦杉叶”为例，史料中包含了介绍自然景物和利用合浦杉叶这一意象来抒发情感和传递历史信息的两方面内容，从中可一窥诗文意象和书写的历史变化。此外，诗文也是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可采用诗文证史的方法与正史、金石文献结合研究。而诸如“合浦珠还”“珠还合浦”及“合浦珠”等这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典故在历代文学经典中的高光现象，足以折射出中玉古代人文历史资源及历代知识精英心目中所形成的合

浦印象。《太平广记》有载：“贞元七年，杜黄裳知举……其年（尹）极^[37]状元及第。试珠还合浦赋。”^[38]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也指出：“德宗贞元七年……刑部杜黄裳知贡举，所取三才人尹枢为首，林藻第十一人……赋题珠还合浦，诗题青云干吕次举。”清人徐松考证，贞元七年（791年）“进士三十人，试珠还合浦赋，以不贪为宝、神物自还为韵”^[39]。故而唐贞元七年（791年）应是以“珠还合浦赋”为科举试题，《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七所收录晚唐宰相令狐楚等人所撰数篇《珠还合浦赋》^[40]则应为当时唐代科举进士科士子应试之作，“珠还合浦”经典进入国家抡才大典之殿堂，由此不难窥见合浦相关历史与人文信息跨越时空的传播轨迹。

（三）宗教类文献

宗教类文献包括僧传、佛道经书、宗教史等史料，收入了从东晋到明代的宗教性著述6种，分别为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释慧皎的《高僧传》、释道世的《法苑珠林》、张君房的《云笈七签》、梅鼎祚编的《释文纪》、杨慎的《丹铅总录》。南朝僧人释慧皎《高僧传》有载：

晋成安元年，交州合浦县采珠人董宗之，于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晋简文帝敕施此像，孔穴悬同光色一重，凡四十余年，东西祥感光跃方具，达以刹像灵异倍加翹励。^[41]

文中提到“晋成安元年”乃东晋简文帝时期。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经过300多年的发展，进入东晋时代，在成帝及康帝、穆帝时期，南朝佛教颇为消沉。汤用彤指出，及至哀帝，复崇佛法。深公、道林，复莅京邑。虽留驻不久，然废帝、简文之世，佛法清谈复极为时尚。^[42]汤用彤认为，及哀帝后，而佛法清言并盛于朝堂。^[43]在这一背景之下，文中所言“刺史表上，晋简文帝敕施此像”一事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可印证佛教自海路传播入中国的脉络与背景。

三国吴黄武七年（228年），合浦郡曾被改称为珠官郡，政府至早在魏晋时期就对合浦珍珠有严格的管控。葛洪在《抱朴子》中所言，“凡探明珠，不于合浦之渊，不得骊龙之夜光”，由此可见，合浦珍珠在西晋时期就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给当时的知识阶层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南朝文人袁粲写给友人的书信《与僧道明书》中提到“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车；璧在邯郸，秦王请以华国”^[44]，可见世俗观念对合浦珠的推崇亦延伸至佛教世界，合浦珠的耀眼光芒由此而转化为对佛教经义文本至尊崇高地位的借喻！

（四）艺术类文献

艺术类文献包括书画谱、书学等，与汉唐合浦相关的内容共收入了宋明清三代的7种

文献，分别是陈思的《书苑菁华》、赵琦美的《赵氏铁网珊瑚》、张丑的《清河书画舫》、汪砢玉的《珊瑚网》、孙岳颁的《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倪涛的《六艺之一录》、卞永誉的《书画汇考》。艺术类文献多有“还珠合浦”“合浦还珠”等提法，可见这一典故已经变成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文化符号，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和词汇文化符号的重要参考。

(五) 书目类文献

书目类文献收入了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1种。《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林藻集》一卷，唐岭南节度副使莆田林藻纬乾撰。藻，贞元七年进士，试《珠还合浦赋》，叙珠去来之意，人谓有神助焉。”^[45]该书保存了岭南士人林藻的著述情况，同时记载了林藻曾担任唐代岭南节度副使一职，有助于我们形成对岭南士人更加完整而丰富的认知。

三、金石资源中的人文印迹

金石文献如碑刻、墓志铭、神道碑等往往记载某人物的重大功绩，或某一时刻的重大事件，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实证。事实上大部分金石文献会遭遇毁失的情况，甚至连拓本也不传，而幸存在总集、类书和杂史中的金石材料，其史料价值往往十分可观，可以补正史传之阙，故而有必要将金石史料单独列出，以备讨论。在合浦历代文献资料中，金石文献所占比例较小，共12篇，分别出自12种文献，详见表1。

表1 金石文献篇名和出处统计表

类别	文献名称	本篇作者	出处	著者
墓志	《御史大夫王公墓志》	[唐]常衮	《文苑英华》卷九百四十二	[北宋]李昉等
	《萧孺人墓志铭》		《荆川集》卷十	[明]唐顺之
	《元故累赠奉训大夫温州路瑞安知州进飞骑尉追封乐清县男林府君墓铭》		《文宪集》卷十九	[明]宋濂
	《周大将军闻嘉公柳遐墓志铭》	[南朝梁]庾信	《文苑英华》卷九百四十八	[北宋]李昉等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一十下	[明]张溥
神道碑	《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	[唐]杨炎	《文苑英华》卷九百八	[北宋]李昉等
			《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六十六	[明]贺复征
	《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唐]杨炯	《盈川集》卷七	[唐]杨炯
			《文苑英华》卷九百一九	[北宋]李昉等
			《四六法海》卷十一	[明]王志坚
《文章辨体汇选》卷六百八十五	[明]贺复征			
《殿中监张公神道碑》	[唐]萧昕	《文苑英华》卷八百九十九	[北宋]李昉等	

类别	文献名称	本篇作者	出处	著者
其他	《萧山灵岩寺碑铭》		《黄御史集》卷五	[唐]黄滔
	《复安南碑》		《司空表圣文集》卷七	[唐]司空图
	《陈徐陵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南朝陈]徐陵	《古偃府》卷四	[明]王志庆
	《六贤祠堂碑》	舒勉	《粤西诗文集》卷三十七	[清]汪森
	《桂林显震庙碑》	王沆	《粤西诗文集》卷三十七	[清]汪森

兹举保存在《司空表圣文集》中的《复安南碑》节选如下：

琅川大扰，洞界横侵。妖徒之勇气干霄，都护之穷兵窜谷。千艘蹙浪，兰津之戍火宵明；万里惊尘，梅岭之人烟昼断。举旄何暇，犹申扣马之忠；曳踵谁观，莫救跼蹐之疹。既而城夷交趾，垒陷功门。飞骏驷以闻天，决神机而起剑。腐儒横议，请罢守于珠崖；贤相拔奇，命启行于黑水。于是凿门受律，杖钺忘家。宸衷辍盱食之忧，壮士重横行之志。岂独英筹独运，犹资平越之庸。妙略遐宣，乃逮伏波之号。声光载路，势激疾雷。下五岭而震金钲，沿三江而飞铁铍。中权令峻，按虎节以风生；上将策奇，指龙编而天落。贼将朱道古等倾巢奔命，负固偷安。寨合浦以连奇，亘同劳而结祲。雕题誓众，犹疑黑穴之神；凿齿穷凶，岂直青丘之暴。尚以哲王济治，先德后刑；大圣兢怀，好生恶杀。韬戈制胜，舞舜戚于两阶；弭节昭宣，纵汤仁之一面。论其归首，霈以鸿私，姑停毙兽之机，显示输龙之信。^[46]

此碑是为高骈收复安南所立，诸史对高骈安南之事所记甚多，懿宗因此事于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大赦天下，可见其意义之重大。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十七载《收城碑》有诗一首：“功业已标征北赋，威名初建镇南碑。终知不朽齐铜柱，况是儒宗缀色丝。”下有注曰：“碑今度支裴仆射撰词。”^[47]故而为收复安南立碑应确有其事，司空图的《复安南碑》可能是同时所作。史传对人物和历史的记载往往有一定的缺陷，而诸如碑文和墓志等资料，由于聚焦墓主或者当时的历史事件，通常记载比较详细，可以弥补其他史传的缺憾。在《陈徐陵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萧山灵岩寺碑铭》《殿中监张公神道碑》《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这几篇碑文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合浦珠”“还珠合浦”，而碑文中并未提到与合浦实际相关的人、事、物，“合浦珠”与“还珠合浦”只是作为典故自然地运用到碑文和墓志的书写当中，此类材料对于墓志书写语言的研究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历代文献中有关汉唐时期合浦文献史料的“家底”得以完整浮出水面。

通过串联起散落于中国古代庞大的、迷宫式的文献文本系统中的“合浦遗珠”，我们对于历代文献典籍中汉唐时期的合浦史料存量状况有以下认识：总量有限，但内容信息涉及面广，传承有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古代岭南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秦代，合浦则于汉武帝平南越时始设郡，大一统秩序下的族群融合、汉化进程曲折而漫长，与此相对应的区域人文传统和乡土文化意识的形成与厚积薄发同样需要长时段历史岁月的积淀。故此直至宋元以后乡邦文献系统的本土传统形成以前，载录汉唐时期合浦早期历史信息的文本多只能借助依附于“外人”的见闻和著述方得以传世。这些“外人”包括曾经仕宦任职于岭南地区的官员、左降流人、流寓与客居此地的文人墨客及勤于立言的岭外士人。显而易见，这样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话语权格局必然会导致合浦乃至岭南地区早期历史记录中书写内容、语汇的选择性倾向。其内容视角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原王朝对岭南地区的征服和治理及大一统秩序的建立与不断强化，原生态族群的逐渐归化，奇风异俗的搜集和展示等，字里行间亦充斥着大量带有文化偏见的民族歧视性语词符号，如“獠”“獠”“獠”“蛮”“夷”等，凡此种种具有中原本位性质的文化优越感于文本书写中的体现，势必会对今天的研究者客观理性地还原和解读合浦及岭南古代文明生态的历史演变进程和实态构成认识上的障碍。同时从技术角度来分析，上述以王朝政治史的总体叙述为特征的文本体例和观光式的文人札记著述，由于分别具有的先天的目的性与偶发性，其有关合浦早期史事的著录自必难言系统，且总量有限。

岭南早期历史文献和著作的大量散佚是今天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然而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古时代博物学传统的形成及以类书为代表的知识传承体系的建立，使得合浦及岭南古史的一部分重要文献材料得以借助这一系统遗存至今，并为宋代以后士人精英的相关著述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但此种存录途径和方式固有的信息碎片化特征，亦令研究者颇有搜罗不易之感。

尽管如此，以今日史家之眼光与视野，仍能通过考镜源流、辨伪存真的方式，从上述传统语境中“断烂朝报”式或稗官杂书类的材料里读取丰富的历史信息：汉唐时期合浦与南海贸易圈的关系、中古时代合浦地方社会的文明生态变迁等。因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历代文献中涉及中古时代合浦的史料信息，对于推进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仍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 [1] [东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中华书局, 1962, 第188页。
- [2] 同上书, 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第1671页。
- [3]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中华书局, 1965, 第2668页。
- [4]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职官部六十三, 州主簿》, 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第1644页。
- [5] [东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四十·毋将隆》, 中华书局, 1962, 第3266页。
- [6] 同上书, 卷九十三《佞幸传·董贤》, 第3740页。
- [7] [东晋]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 张烈点校, 中华书局, 2002, 第125-130页。
- [8]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 中华书局, 1965, 第838页。
- [9] 同上书, 卷八《孝灵帝纪》, 第340页。
- [10] 同[8], 第345页。
- [11]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传下》, 中华书局, 1975, 第6326页。
- [12]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八《刺史上》, 中华书局, 1960, 第1200页。
- [13]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门下省卷第八》, 陈仲夫点校, 中华书局, 1992, 第247页。
- [14] [西晋]郭璞注, [北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十《释畜第十九》,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第591页。
- [15] [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 商务印书馆, 1955, 第9页。
- [16] [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八十九《木部中》, 汪绍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1547页。
- [17]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七《木部六》, 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第5652页。
- [18] 杨恒平:《关于刘欣期(交州记)辑佚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期, 第47-52页。
- [19] 靳士英、靳朴、刘淑婷:《(南方草木状)作者、版本与学术贡献的研究》,《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第306-310页。
- [2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 中华书局, 1965, 第622页。
- [21] 同[19], 第308页。
- [22] 靳士英、靳朴、刘淑婷:《(南方草木状)作者、版本与学术贡献的研究》,《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第310页。
- [23]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六十五《木类二》,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9, 第730页。
- [24]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中华书局, 1965, 第2733页。
- [25] 李零:《战国秦汉方士流派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2期, 第34-48页。
- [26] [北宋]李昉等辑《文苑英华》卷二百四十七江总《遇长安使寄裴尚书》, 中华书局, 1982, 第1247页。
- [27] [唐]宋之问撰, 陶敏、易淑琼校注《宋之问集校注》卷三《桂州三月三日》, 中华书局, 2001, 第560页。
- [28] [西晋]陈寿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八·张严程阚薛传》, 中华书局, 1982, 第1251页。
- [29] [北魏]酈道元著, 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 中华书局, 2007, 第833页。
- [30] [北宋]王象之编著《輿地纪胜》, 赵一生点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第2745页。
- [31] [北宋]欧阳忞:《輿地广记》, 李勇先、王小红校注,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第832页。
- [32] 黄永年:《唐史史料学》, 中华书局, 2015, 第102页。
- [33] [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一《天部上》, 汪绍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第18页。
- [34] [唐]段成式撰, 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前集卷十六《广动植之一·毛篇》, 中华书局, 2015, 第1192页。

- [35] [北宋]陶穀、吴淑：《清异录·江淮异人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85页。
- [36] [北魏]贾思勰撰，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卷十，中华书局，2009，第1112页。
- [37] 除《太平广记》作“尹极”之外，其余诸书皆作“尹枢”，应作“尹枢”。
- [38]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八十《贡举三·尹极》，中华书局，1961，第1340页。
- [39]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二，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457页。
- [40] [北宋]李昉等辑《文苑英华》卷一百一十七尹枢《珠还合浦赋》，中华书局，1982，第533页。
- [41]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兴福·晋并州竺慧达》，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2，第478页。
- [4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128页。
- [43] 同上。
- [44]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八《梁京师灵味寺释宝亮》，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2，第337页。
- [45]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别集类上》，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481页。
- [46] [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七《复安南碑》，载《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02页。
- [47]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十七《献诗启》，中华书局，2007，第593页。